



依田熹家著作集(五)

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

[日] 依田熹家 / 著
雷慧英等 / 译 卞立强 / 校

JINDAI RIBEN DE LISHI WENTI



上海遠東出版社



依田熹家著作集(五)

K313.407
Y572.91

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

〔日〕依田熹家 / 著
龔慧英等 / 译 卞立强 / 校

HINDAI RIBEN DE LISHI WENTI

上海遠東出版社

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

依田惠家著作集(五)

著 者 / 依田惠家

译 者 / 雷慧英等

译 校 / 卞立强

责任编辑 / 潘龙杰

装帧设计 / 范桥青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娄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36)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72 千字

印 张 / 6.625

插 页 / 1

ISBN 7 - 80661 - 766 - 3
K · 25 定价：15.00 元

出版说明

依田惠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一位热爱和平、长期致力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罪行进行研究批判和揭露的进步学者，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和中国史学界有着较高的声望。

依田惠家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在其著述中从多层面探讨了日本历史的演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深入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战争罪行，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依田惠家所占有的大量史料，许多为国内学界少见，其不少观点也自成一家之言，可供国内学者研究和借鉴。这些均是我们出版其著作的原因。

依田惠家毕竟是生活在日本的学者，他在研究中日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时，有些看法，与国内学界有所不同，我们出版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我们的观点与其完全一致，而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大的原则的前提下介绍一家之言。另外，本译文集也以译者注的形式，利用手头现有的中方资料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补充说明，以便读者全面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某些有特定政治涵义的用语（如近现代史上日占时期的“满洲国”、“关东都督府”等），或加脚注予以揭露，或加引号以示其伪国家、伪政权的本质；再如书内满、台、港等中国地区往往与朝鲜、日本乃至中国交互并列，均作必要处理以正视听。至于所引文献资料原文而涉及此类问题者，作为史学译著存其原貌，当然不代表我们和依田先生的立场和态度。

总序

卞立强

依田惠家先生 1931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牛込区(现属新宿区)早稻田南町,上的是早稻田小学。二战期间,东京遭到美军大轰炸,他回原籍长野县避难,上了故乡的初中,高中是在早稻田大学附属高中上的。1951 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东方史专业。毕业后又读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1966 年进入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助教、讲师、副教授到 1995 年升任教授;1998 年随着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早大亚太研究中心,转任该中心及该中心研究生院的教授,直至 2002 年退休;现为早大的名誉教授,并个人创办了日本史研究所,仍然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他从小就生活、学习、工作在早大的自由清新的学术氛围中,一辈子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学术的真理,有时他自己也自嘲是繁华的大东京中的“城市隐士”。我想这是依田其人及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特征。

依田先生主要生活的 20 世纪的后半期,是激烈动荡的时代。他继承了早大民主与进步的传统,从大学时代就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特别是日中友好运动,1970~1978 年曾担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常任理事。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他特别致力于中日民间学术交流的活动,数十次来中国访问、讲学,促进了早大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建立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与此同时,他在日本热情接待和亲切照顾了许

多中国的访日学者和留学生，有些留学生就直接受教于他的门下，为中国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可以认为，他作为一位民间人士，在促进中日友好和民间学术交流以及为中国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他仍然身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以及湖南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顾问教授，每年都来中国讲学，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学术交流，继续发挥“余热”。

依田先生研究的学术领域是日本史。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进步的唯物史观，批判反动的皇国史观和近年来猖獗一时的所谓的“自由史观”。运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资料，正确阐述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揭露了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朝鲜的残酷的剥削、掠夺和侵略。本文集卷一收录的《简明日本通史》，是依田先生在中国讲学时所使用的讲稿。已故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准确扼要的评价，并推荐说：“这部书既可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对日外事工作人员检阅和参考。”卷二《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着重从经济上揭露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的资料、统计和图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资料，然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轻轻点上几笔，勾画出侵略者险恶狠毒的用心和狰狞面目，反推出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卷三中收录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论述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在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朝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也在中国、朝鲜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卷三中收录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和卷四《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全面现代化时期，作者新撰的论著。后者是学术专著，前者通俗易懂地概述了后者的主要内容。两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背景的“异”与“同”，特别强调了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性的差异。它们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卷五《近代日本的历

史问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其中涉及明治维新、天皇制、自由民权运动以及战前日本的殖民政策、军部独裁等近代日本史中的重大问题。《战后教科书问题》一文中,揭露主审教科书的文部省(教育部)文教官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反动的皇国史观的传统。这表明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屡屡发生,日本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五卷文集收录了依田先生关于日本史和中日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对中国友好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相信文集的问世对我国日本史的研究会有所参考、启发和促进。广大读者通过文集可以认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异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从而加深对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的理解。我要向年逾古稀的老朋友依田熹家先生的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祝愿他老当益壮,不断地有新的著述问世。

这部文集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邹韬奋纪念馆馆长雷群明先生以及复旦大学教授蒋凡和陆康强先生也对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集的译文除我翻译的外,还收录了其他许多先生的译文。在汇编时,我作了若干校改,并统一了一些词汇的译名。其责任当然由我来负。如有错误,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3年9月11日

于上海旅次

目 录

近代天皇制成立的前提

——试论孝明天皇	戎芬 阜凌 译	1
前言		1
神奈川条约与孝明天皇		3
安政条约与孝明天皇		5
尊皇攘夷派抬头期的孝明天皇		18
反尊攘派政策的出台		23
结束语		25

幕末天皇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天皇

吕永和 译	29
前言	29
近代天皇制的前提	30
明治维新政权与天皇的位置	43
政府内部的君权限制论	52
天皇在明治宪法体制中的地位	60
结束语——“定君权、限民权”.....	67

明治维新

刘建华 译	71
明治维新的前提条件	71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	73
明治维新的前奏	77
明治维新的过程	80
关于明治维新的意义和性质辨识	103
日本近代国家成立的时间	109

自由民权时期亚洲形势与自由民权思想	雷慧英 译	112
关于东亚近代化		
——国际关系及其与西洋文化的接触		
.....	林知平 译 胡令远 校	120
引言.....		120
东亚近代化的国际因素.....		121
西洋学术的摄取.....		125
日本的殖民统治		
——形成及其作用	王振锁 译	136
日本殖民统治前史、“琉球处理”与“征韩论”——册封体制		
与亚洲各国.....		136
殖民帝国的形成.....		1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的殖民地.....		162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各阶段.....		173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政治体制		
——军部独裁成立的原因	雷慧英 译	177
前言.....		177
明治宪法体制.....		179
“元老”衰退与议会势力抬头.....		185
军部势力抬头与总体战体制.....		192
结束语.....		197
战后教科书问题		
雷慧英 译	198	
“教科书问题”的根源在于“教科书审定制度”.....		198
日本的保守势力为什么要为过去的行为辩护.....		199
“文部省史观”的支柱是“明治百年国家祭典”.....		200
日本历史学者的课题.....		201

近代天皇制成立的前提

——试论孝明天皇

戎荪 阜凌 译

前 言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而崩溃的近代天皇制，至今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历史问题。这是因为在锁国政策解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日本的资本主义实现了飞速发展，几乎达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① 与此同时，它具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色，即在政治、思想、土地制度等方面遗留下许多前近代的因素。而且，近年来，日本近代天皇制又是亚洲唯一的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以上都是天皇制备受历史研究人员注目的原因。

日本作为一个特殊的近代国家，怎样看待其近代天皇制的世界地位（当然包含有批判的成分）仍然是当今的一个课题。

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天皇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时期曾经兴盛一时，但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镇压。直到二战战败，战前的天皇制崩溃才解除了这一限制和镇压。

尽管如此，对于近代天皇制的研究，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战后的研究都有一个特点，即几乎都不涉及天皇本身。

^①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20 世纪初叶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译者

在战后的研究中，触及天皇本身的研究非常少，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史料的问题；二是对天皇的政治地位的评价问题。

关于天皇本身的研究，至今还有大批史料尚未公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明治时期的主要文献几乎都未发表。可以说《明治天皇纪》全卷是一部由各类记录组合而成的“年代记”，但是却没有“宸翰”或“手稿”之类来反映天皇自身的意志及行动的资料，只有一些就制度而言的“敕语”和“敕论”，能够窥探天皇本人想法的资料只有“御制”和歌之类道德与精神的文献。另外，由元勋、亲信等人口述或笔录流传下来的天皇逸事也都是些日常生活的琐事，甚至连各个时期臣子提交给天皇的“御元书类”都未曾公开过。这一切给当时政治中枢的某些方面蒙上了一层面纱；在史料方面，仍然存在着天皇的“神圣感”。

有人认为，与明治天皇相比，拥有较多“宸翰”的孝明天皇，其末期的史料也大多被巧妙地隐藏了。

另一个影响天皇研究的原因是研究的出发点问题。

战前近代史的研究，除了一些反体制立场的研究之外，几乎都是从“王政复古”的立场来论述，过于强调了天皇的作用。德富苏峰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就是其中的代表。

近代天皇制由于二战战败而崩溃，代之以“象征天皇制”。如前所述，此后关于幕府统治末期以后的研究很少提及天皇。^① 我想这是因为战争中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王政复古史观”过于强调天皇的作用，为了纠正这一观点，才很少涉及天皇的研究。此外，也可以说是因为幕府统治末期以后，在历史上仍将天皇置于“象征的”位置，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象征史观”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充分地说明客观事实与作用。

^① 田中惣五郎在《天皇的研究》中记载了幕府末期天皇的经济状况等，但基本没有涉及孝明天皇的行动。《天皇的历史》（福村出版）几乎都是关于古代、中世天皇的论稿，只有京口元吉的《明治天皇》一篇有所涉及。井上清的《天皇制》、根津雅史的《天皇家的历史》记载了幕府末期孝明天皇与尊攘派的矛盾，但并不是出自以近代天皇制为前提的立场。田中彰的《通往近代天皇制的道路》也是有关明治时期的著作。

明治以后时期，不公开史料，而是根据明治宪法将天皇制作为一种制度，把天皇自身的行动置于内阁、枢密院等国家机关、元老、军部这些实际上的推进母体当中。与此不同，幕府末期天皇的存在是在旧制度崩溃和新制度尚未成立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独特的存在。即使根据现在可见的史料，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天皇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行动，他的行动不仅成为近代天皇制成立的前提，也成为了其成立的反面教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孝明天皇作为幕府末期的历史人物，其活跃时期很长。孝明天皇的活动时期从佩里来航日本到“大政奉还”的前夜，贯穿了整个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期间。而当时其他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只活跃了很短一段时间。

而且，通过现存的孝明天皇的“宸翰”可知，同时代的公卿自不用说，他比当时的任何藩主等历史人物都态度强硬，同时拥有将意见付诸实行的力量。

从以上几点来看，可以说孝明天皇不仅在幕府末期的政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近代天皇制的成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孝明天皇的行动，客观地评价他的历史作用。

本文尝试探讨以上的问题。（所引史料如无特别标注，都出自《孝明天皇纪》）

神奈川条约与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有关国政的发言最早出现在佩里^①来航的前八年，

① 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1853年率舰至日本，1854年复至，停泊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中国史书多以“培理”之译名出现，但也见“柏利”、“培利”、“彼理”等多种译名，似未约定俗成，故本书取“佩里”，亦即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采用之规范音译。——译者

即 1846 年(弘化三年)的《意旨书》当中。他说：“风闻近年时时可见异国船只，然值本国文道能修、武事全整之时节，海防尤坚固，本无所虑。但近顷屡闻其事甚为挂念。望各将士对洋寇不侮小寇，不畏大贼，施以良策。为保神州之无瑕，宜严格操练，才可安皇室之心。故特发此令。”那时孝明天皇十六岁，即位仅半年。因此大家认为这种行为是由当时的关白鹰司政通主导的。那时的政治与一般百姓几乎毫无关系，但日本周围的形势变化已经波及到了宫廷内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产生了所谓“北边问题”的对外问题。1840 年(天保十一年)的鸦片战争使得欧美各国急速推行将亚洲殖民地化的政策。其结果，一直以垄断对日贸易为基本方针的荷兰，为了掌握日本开国的主导权，于 1844 年(弘化元年)向幕府递交了敦促开国的国书。1845 年(弘化二年)英国船只到达浦贺，1846 年(弘化三年)美国海军司令毕德尔航行到浦贺，同年荷兰第二次递交国书，每年都有这类催促日本打开国门的行动。特别是以后期水户学风靡日本思想界的水户齐昭号召世人警惕对外问题，他在推进藩内改革的同时，于幕府末期时常四处活动。水户齐昭通过与五摄家之一的鹰司家的联姻关系，也常向京都方面做工作。与水户藩渊源很深的鹰司家担任关白期间，弘化三年《意旨书》的提出，不能不说与水户齐昭的活动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如果说水户学的影响表现为这种形式，那么，也可以说是水户学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天皇对对外问题(当然与对内问题有关)发言一事可知，幕府的权威已发生了变化；此外，后期水户学的尊王论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浪潮，天皇也成为其拥护者(对天皇而言是自身的觉醒)。前期的水户学主要致力于日本国内封建统治体制的理论建构，与此不同，后期水户学以会泽安的《新论》为代表，认为西洋诸国是“夷狄”，强调他们侵略的危险性，并通过这种对外危机感，建立了民族、国家的自觉性。而且，《新论》强调了日本依照天照大神的神敕，其子孙天皇始终居于天子之位，具有优越于其他各国的独特性。当时的《新论》认为西洋诸国“乘民心之涣散，阴诱边民，暗移其心”，

极其重视对外危机中国家的统治中心——天皇的存在。如下文所述，孝明天皇的思想可以说也是遵循着后期水户学的轨迹。

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来航，第二年(安政元年)日美神奈川和好条约缔结，对此，孝明天皇并没有作出特别的举动。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方面理解神奈川和好条约只是允许外国船进入下田、箱馆两个港口，而且只是提供粮食和饮水。这在打开锁国政策的突破口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外交关系、通商关系的问题还悬而未决。所以安政元年闰7月，朝廷向幕府发出的《达书》中说：“先前渡来之美国船只退帆之时，自行停泊于以上两处。此行径已犯本国制度。然其时船军整备未及，可平稳处置之。水陆军事未整之际，唯有此法”，暂且承认了幕府的处理方式。但同时，文书中又提出：“但若以此姿态经年累月，异类更侮，熟知贼谋实属不易。加之诸夷纷纷来日，致使国家疲弊，国体如何，睿虑不安”，说明了“睿虑”不能再作出更大的让步。也就是说，文书中对于神奈川条约的承认，只是一种“特例”的处理，而且希望对象只限于对美国一国。此外，文书中还说：“于武门亦应警戒无懈，遵弘化三年八月所颁之令，各国(各藩)尽全力，当为神州之无瑕而勤练军事。再感睿虑，特发此令”，从其因袭先前弘化三年的文书来看，可以说当时孝明天皇的意志是主张将对外问题纳入神奈川条约的范围之内。在之后的许多文书中，孝明天皇都主张以神奈川条约作为处理对外问题的限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份《达书》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孝明天皇的意志。

安政条约与孝明天皇

拒绝敕许条约

如前所述，孝明天皇主张将对外关系纳入神奈川条约的范围

之内,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允许他这样做。

继美国之后,日本与英、俄、荷等国缔结了和好条约,与更多国家建立了联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领事哈利斯于1857年(安政四年)逼迫日本正式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幕府早在佩里第一次来航时就放弃了一向外交、内政的专断独行,开始征集诸位大名以及布衣以上阶层的意见。但是在是否接受安政条约的问题上,幕府内部出现了完全对立的意见,所以在再次征集意见的同时,让首席老中崛田正睦前往京都,求得天皇对条约的敕许,意图通过天皇的敕许让条约的缔结具有权威性。

这种行为本身打破了一直以来一切内政和外交都由幕府掌控的原则。虽然征集各大名的意见是个特例,幕府自己还是以“参考意见”的形式保留决定权,但这种做法还是增大了各大名,特别是雄藩的发言权。“敕许”的申请,理念上是为得到把内政、外交的一切大权委任给幕府的天皇的承认,但在尊王论抬头的情况下,这是一件大事。此外,这个“敕许”出乎意料地直接受到了孝明天皇的强烈反对。孝明天皇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政治行动。

1858年(安政五年)1月17日,孝明天皇给九条尚忠关白的文书(宸翰)中写道,这次的事件“实为异事,乃天下之大事。诚忧虑之至”。他意识到问题重大的同时指出“敕问虽形式相同,然实已无济于事”,强调这一问题的处理不能像此前那样,由幕府提出公式化的报告,然后由天皇象征性地垂询公卿和老中这样的“形式”来解决。“此实乃天下之大事故众卿畅所欲言即可”,他希望公卿们对这个问题能踊跃提出自己的见解。文书中进一步指出“备中守(崛田正睦)此次上京献物之事,事后已从公卿处听闻。所献之物如前所述,纵其如何贵重,唯使人目眩且为天下灾害之本。人之贪欲不外乎为黄白所迷。心迷之事其限有之,然此心迷将致骚动”,认为金银从来都是幕府与京都朝廷打交道时的必备品,但也

应该防范用金银贿赂收买公卿。“如上所述，朕不受任何金银之物。”天皇拒绝接受幕府的进贡，是想从自身做出榜样。

接着，孝明天皇在上述文书中阐述了反对缔结条约的理由：“日本国中不服将造成大骚动，若依夷人之愿则为天下一大事。代朕行此仪式则其后耻辱无尽。且于伊势（神宫）始处，羞愧万分。面对诸位先祖，朕身不孝无地自容。实为担心。”就像文中所说，他反对的理由在于国内秩序的稳定以及日本的独立将会受到外国的威胁。

同月 25 日，天皇向大纳言、中纳言、参议征求了外交意见。在 26 日送交关白的文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次各所存书令已阅，多为同意之意见，然朕仍存顾虑，望诸君听取。”这里孝明天皇认为“……开港开市之事，任阁老上京如何游说，固否决之，况距畿内不远，禁设之”，他坚决反对开国、贸易，特别是强烈反对在京都附近设置港口。“又及夷人要求开港之事，若应允之，则成为天下之大事，于愚身难以应允，凡事皆不许。夫异人之辈不听者，其时攻之可矣，此为朕之决心。”他指出就算因拒绝条约而开战也在所不辞，表明了强烈的反对立场。

孝明天皇在文书中提出“就此事凡三家以下诸国大小名，敕问皆应畅所欲言。同意签约者定有之，然应允夷人要求之事，实为天下之忧”。天皇认为应该向幕府亲藩的三家以下以及幕府统治下的全部大名征集意见（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反对签约的意见），“畠田备州（正睦）又上书，朕未应允，不快。后以出家相威胁。此天下之大事，任备州一人如何要求，朕决无疑惑，当以更强意志返答可矣。万众一心于太阁（鹰司政通）一处，定能成稳定之大局。然当职之事，若无远虑，不努力，事态发展可忧。”这里更表明了不同意敕许，任凭幕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也不承认的意志。从以上几点来看，这一阶段的孝明天皇在努力集结公卿力量的同时，也在动员各大名，摆出了不畏幕府最高负责人施压的态度。后面提到孝明天皇根本不曾想要否定幕府的存在，而且这个念头始终没有改变，但史料中所表明的孝明天皇，对公卿自不用说，他还想要位于统率幕府和各大名即

当时所有统治势力的顶峰。当时下级武士的势力还未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抬头，人民的力量也未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可以说他面对的势力就是当时所有的政治势力。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仅仅是形式上、精神上的主权者开始向实际意义上的主权者蜕变的王者之姿。

想要使天皇从形式上、精神上的主权者向实际上的元首转变的倾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2月16日，孝明天皇在给左大臣近卫忠熙的文书中写道，“据云诸大名以下人等，经深思熟虑，皆愿以朕马首是瞻，然如汝所知，朕一愚昧短才之质，毫无气量”，显示出诸侯们也希望天皇是国内统一的中心。这个阶段的统一是以幕府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必须注意到诸侯也一直在期盼天皇能成为“元首”。这是因为：①江户时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形势要求实现一个以统一市场为基础，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形势。而且，一直以来赋予幕府权威的尊王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②对外问题的产生及深化，提高了人们对作为国内统一中心的天皇的期待。③由于幕府权威的丧失、将军家庆的过世、将军家定的愚笨、病弱，包括大名在内的各阶层寻求强权中心的风潮高涨。同时如前所述，孝明天皇也觉察到自己所处的状况，一直在努力满足大家的期望。在文中他说道：“并非朕欲成为宜者，实皆为日本国之故，决非为朕一人。望众人贤察。此次之答复，照目前之状况，恐难慰众人所愿，心痛不已。”这里可以看出孝明天皇将自己的意志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至此，孝明天皇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逐渐成为日本的代表。

安政条约的敕许问题发生之初，太阁鹰司政通的意见是：遵循以往的惯例，向幕府提出一些问题，其后天皇应该给予许可。因此，孝明天皇在此前1月26日的文书上说：“太阁之处虽有温和指示，万一当事之人无远虑，不努力，事态发展可忧。”2月26日给左大臣近卫忠熙的文书里也指出：“唯愿尊公为朕之同盟，厚恩恐难表尽。虽意见不同者有之，望众人不懈努力。”22日送交关白九条尚忠的文书提到：“太阁处之意见，与愚身思虑不符之事，明日书信